



儒释道与中国民俗

(修订本)

刘仲宇 · 著

儒释道与中国民俗

(修订本)

刘仲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释道与中国民俗 / 刘仲宇著. —修订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0

(智慧的探索丛书)

ISBN 978 - 7 - 5495 - 8383 - 6

I. ①儒… II. ①刘… III. ①儒家—关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②佛教—关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③道教—关系—风俗习惯—研究—中国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4462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肖莉 刘孝霞

特约编辑: 李春勇

装帧设计: 徐妙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690mm × 960mm 1/16

印张: 32.75 字数: 486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9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智慧的探索丛书”编委会

(以汉语拼音为序)

陈卫平 冯 棉 高瑞泉 刘广汉
童世骏 杨国荣 郁振华



作者简介

刘仲宇,1946年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资深的道教研究专家。从事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三十余年,早年以研究《周易》及宋明理学为主,1982年后,主攻道教。有《道教影响下的朱熹》、《道教思维方式探微》等论文150余篇,个人学术专著近20本,代表作有《中国道教文化透视》、《儒释道与中国民俗》(1922年版)、《道教法术》等,新出成果《道教授箓制度研究》被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与人合作项目20余项,包括《中华道教大辞典》(副主编)、《中华道藏》(副主编)等大型项目。多次赴美国、德国、东南亚、韩国等地参加国际会议或讲学。研究领域广泛,善于做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总 序

杨国荣

作为把握世界的观念形态,哲学的内在规定体现于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这不仅仅在于“哲学”(philosophy)在词源上与智慧相涉,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缘于以下事实:正是通过智慧的追问或智慧之思,哲学与其他把握世界的形式区分开来。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作为哲学实质内涵的智慧,首先相对于知识而言。如所周知,知识的特点主要是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典型的形态即是科学。科学属分科之学,中文以“科学”(分科之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无疑也体现了科学(science)的特征。知识之“分科”,意味着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世界:如果具体地考察科学的不同分支,就可以注意到,其共同的特点在于以不同的角度或特定的视域去考察世界的某一方面或领域。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等等,侧重于从特定的维度去理解、把握自然对象。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则主要把握社会领域中的相关事物。无论是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都界限分明。以上现象表明,在知识的层面,对世界的把握主要以区分、划界的方式展开。

然而,在知识从不同的角度对世界分而观之以前,世界首先以统一、整体的形态存在:具体、现实的世界本身是整体的、统一的存在。与这一基本的事实相联系,如欲真实地把握这一世界本身,便不能仅仅限于知识的形态、以彼此相分的方式去考察,而是同时需要跨越知识的界限,从整体、统一的层面加以理解。智慧不同于知识的基本之点,就在于以跨越界限的方式

去理解这一世界,其内在旨趣则在于走向具体、真实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一意义上的“智慧”主要与分门别类的理解世界方式相对。

具体而言,智慧又展开为对世界的理解与对人自身的理解二重向度。关于世界的理解,可以从康德的思考中多少有所了解。康德在哲学上区分把握存在的不同形态,包括感性、知性、理性。他所说的理性有特定的含义,其研究的对象主要表现为理念。理念包括灵魂、世界、上帝,其中的“世界”,则被理解为现象的综合统一:在康德那里,现象的总体即构成了世界(world)。^①不难注意到,以“世界”为形式的理念,首先是在统一、整体的意义上使用的。对世界的这种理解,与感性和知性的层面对现象的把握不同,在这一意义上,康德所说的理性,与“智慧”这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处于同一序列,可以将其视为形上智慧。确实,从哲学的层面上去理解世界,侧重于把握世界的整体、统一形态,后者同时又展开为一个过程,通常所谓统一性原理、发展原理,同时便具体表现为在智慧层面对世界的把握。

历史地看,尽管“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概念在中国相对晚出,但这并不是说,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不存在以智慧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的理论活动与理论形态。这里需要区分特定的概念与实质的思想,特定概念(如“哲学”以及与哲学实质内涵相关的“智慧”等)的晚出并不意味着实质层面的思想和观念也同时付诸阙如。

当然,智慧之思在中国哲学中有其独特的形式,后者具体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中国古代没有运用“哲学”和“智慧”等概念,但却很早便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追问。从实质的层面看,“性与天道”的追问不同于器物或器技层面的探索,其特点在于以不囿于特定界域的方式把握世界。

“性与天道”的追问是就总体而言,分开来看,“天道”更多地与世界的普遍原理相联系,“性”在狭义上和人性相关,在广义上则关乎人的整个存在,“性与天道”,合起来便涉及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这一意义上的“性与天道”,在实质层面上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对象。智慧之思所指向的是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关于“性与天道”的追问,同样以宇宙人生的一般原理为其实质内容。

^① 参见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 K. Smith, Bedford/St. Martin's Boston, New York, 1965, p. 323。

从先秦开始,中国的哲学家已开始对“道”和“技”加以区分,庄子即提出了“技”进于“道”的思想,其中的“技”涉及经验性的知识,“道”则超越于以上层面。与“道”“技”之分相关的是“道”“器”之别,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便表明了这一点,其中的“器”主要指具体的器物,属经验的、知识领域的对象,“道”则跨越特定的经验之域,对道的追问相应地也不同于知识性、器物性的探求,作为指向形上之域的思与辨,它在实质上与智慧对世界的理解属同一序列。至中国古典哲学终结时期,哲学家进一步区分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与“性道之学”,在龚自珍那里便可看到这一点。器物之学或专门之学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性道之学”则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原理。在器物之学与性道之学的分别之后,是知识与智慧的分野。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哲学不仅实际地通过“性与天道”的追问展开智慧之思,而且对这种不同于知识或器物之知的把握世界方式,逐渐形成了理论层面的自觉意识。

可以看到,以有别于知识、技术、器物之学的方式把握世界,构成了智慧之思的实质内容。西方的 philosophy,中国的“性道之学”,在以上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超越分门别类的知识、技术或器物之学,以智慧的方式把握世界。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以“性与天道”为内容的智慧之思,在社会的变迁与思想的激荡中绵延相继,并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哲学进路。这种趋向在中国当代哲学的发展中依然得到了延续,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便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点。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她的奠基者为冯契先生。冯契先生早年(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金岳霖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以注重理论思考和逻辑分析见长,并由此在中国现代哲学独树一帜,金岳霖先生是这一哲学进路的重要代表。他的《逻辑》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界对现代逻辑的把握,与之相联系的是其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他的《论道》展示了对“性道之学”的现代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形上智慧的思与辨;他的《知识论》注重知识的分析性考察,但又不限于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进路,而是以认识论与本体论的融合为其特点。金岳霖先生在哲学领域的以上探索,可以视为以智慧为指向的“性道之学”在现代的展开,这种探索在冯契先生

那里获得了承继和进一步的发展。与金岳霖先生一样,冯契先生毕生从事的,是智慧之思。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先生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楔入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先生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既上承了金岳霖先生所代表的近代清华哲学进路,又以新的形态延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历程。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创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同时,也把清华的哲学风格带到了这所学校,而关注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理论研究的交融,重视逻辑分析,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则逐渐构成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独特学术传统。半个多世纪以来,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经历了从初建到发展的过程,其间薪火相传,学人代出,学术传统绵绵相续,为海内外学界所瞩目。以智慧为指向,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同时具有开放性:在上承自身传统的同时,她也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富有个性的创造性探究,并为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人提供充分的发展空间。这里体现的是哲学传统中的一本而分殊:“一本”,表现为追寻智慧过程中前后相承的内在学术脉络,“分殊”,则展示了多样化的学术个性。事实上,智慧之思本身总是同时展开为对智慧的个性化探索。

作为哲学丛书,“智慧的探索丛书”收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几代学人的哲学论著,其中既有学科创始人的奠基性文本,也有年轻后人的探索之作,它在显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展示了几代学人的智慧之思。在冯契先生 100 周年诞辰到来之际,这一丛书的出版,无疑有其独特的意义:它不仅仅表现为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传统的回顾和总结,而且更预示着这一传统未来发展的走向。从更广的视域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衍化,同时又以当代中国哲学的演变为背景,在此意义上,“智慧的探索丛书”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

2014 年 11 月 28 日

序

刘仲宇

经过一年多的修订,终于可以定稿了。在正式出版时,还得写几句,交待一下写此书的用意。

—

本书初版于1992年,当时印数很少,但是却引起了同行们的兴趣。盖我的学术起点是中国哲学史,以后又转到道教研究上,算是从哲学跨到宗教学。而做这两件事的,大多集中在本领域中的学术问题,不大理会其余。而本书讨论的,则是儒释道与中国民俗的关系,又一脚踏进了民俗学。在中国,近代的学科分化极其明显。学科分化,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得各种学术致于精细,从而深入。但因为在学校的教育中、科研管理的类别中,都定为制度,遂使分科趋于分隔。我们的先辈们尽管做着不同领域的研究,却是文史哲不分家,当代学人就有些难了,人们很少在几个学科中往来穿行。弄哲学和宗教的,很少跑到民俗中去,搞民俗的,也极少对宗教领域涉足,所以本书稍稍有点儿特点,出来后引起了同行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

曾任《世界宗教研究》主编的郑天星研究员,便约我将书的内容浓缩成文章,1996年,发表在他们刊物上^①。其后,我都没有回到直接以民俗为题的研究上来,但实际上,却没有完全离开民俗。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道教的法术上,兼及仪式,有时也做点儿当代宗教的考察分析。而佛道的仪式,经常在民间举行,算是道教给民众提供的主要的宗教服务,与民间风俗无法绝对分开。又应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的胡小静^①兄之嘱,写了本《中国精怪文化》,其中多涉民间的信仰习俗。进入21世纪后,在台湾出了本《中国民间信仰与道教》,目光集中在道教与民俗中的一部分信仰习俗的关系上。至于《道教法术》一书,为自己研究的主要代表性成果,多多少少也离不开民俗。进入21世纪,上海市道教协会的领导想出一本通俗说道教的,鉴于此类书已经出过几本,想写出新意非常难,遂建议编一本谈道教风俗的书,于是与当时的会长史孝进一起主编了《道教风俗谈》(上海辞书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是时隔十年后,再次直接回到风俗的话题。2006年,出了本《正逢时运——接财神与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对民间信仰事象的观察与分析,对社会风尚的考察。所以总的来说,近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常迈入民俗领域,似乎与之缘分难尽。同时,本书初版离现在二十多年了,一些朋友来索取,只能摊手。故当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希望提供一部著作以庆冯契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便想起来将此书修订再版。

二

在中国,民俗学和宗教学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学科。中西历史、社情和文化发展的路数颇多差异,从西方引入的学科及其基本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

^① 小静是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的哲嗣,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职多年,编辑的学术著作极多。曾产生很大影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便是在他担任主任的编辑室完成的。惜乎天不假年,正当盛年即归了道山。在此记上一笔,以表追思之情。

情形,便难免出现问题。以宗教学为例。西方的学者,一般将古代的自然崇拜、祭祀看成宗教的初级形态,而对于巫术,则不作如是观。在基督教等一神教中,巫术是清除的对象,中世纪时,教会甚至将被指为女巫的人活活烧死。然而在中国,祭祀与巫术并不能明确分开,而且,都成为制度化宗教如道教的必具成分。西方的学人,常用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宗教的历史,认为古代的氏族宗教进化到部落宗教再到民族宗教、国家宗教,最后分泌出一神教。这是符合西方宗教发展的基本线索的。但是中国宗教就不按此发展,有无国家宗教还是两说,没有归结为一神教则是基本的事实。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以他们的信仰为标准,分出所谓的“高级宗教”,中国的传统宗教显然不在其中。而中国民间大量存在着的对神灵散漫的有时无序的崇拜,在他们眼里则只能斥为迷信了。这些使得中国学者反思,包括什么是宗教这样的问题也常常会重新提出。民俗学也是一样。所以,这些领域都少有成熟的理论,可作为观察的基本模型,分析的解剖刀。本书中资料引证不少,理论分析却较薄弱,与目前这些学科的先天的不足有关,当然更多地是源于本人的学养不足。对此,本人有自知之明,所以每做一项研究,对于使用的方法和理论,都会反思。对于西方世界已经有的理论建树,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别作思考。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泥古,也不可泥洋。记得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臣》,取二三策而已。若合用则取二三策,不合用则过眼即忘。对任何人的论述、理论、方法,都应取这样的态度。

三

本书最初提出的任务,是从所谓三教与民俗的关系上,看中国文化。尽管在整体的理论分析上,还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但在三教与民俗的具体领域的关系方面,还算是下了较多的功夫,在资料的搜集和具体分析上,也算差强人意。中国的典籍之多用“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要说浩如烟海,勉强可算贴切。20世纪90年代,哪一年记不清了,小静兄邀我去参加他们开发

的《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的讨论会,会上得知四库共有汉字七亿多,端的十分惊人。而它虽然是我国流传下来的最大的丛书,却远非典籍的全部。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90年代推出《续四库全书》,字数也与四库约略相当,当然仍未搜罗无遗。例如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都有大藏经,四库所收只有其中的一个小角落。其余未入库、未入藏,散在民间的书,究竟有多少,还属未知。文献多,对于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也由之出现了许多难题。就像进百货公司挑商品,越多越容易找花眼。况且谁都无法在一生中跑遍全世界的百货店,最伟大最博学的大家,恐怕也无法看全数十亿汉字,只有根据研究的需要,尽可能搜集到更多的文献资料。本书的内容,跨度很大,每一个具体问题涉及的资料都十分丰富。笔者的功力和精力都有限,只能尽自己之力罢了,实在不敢夸口有多丰富,更不敢说已经穷尽。不仅如此,就是在修订时,也不敢说把自初版问世以来,学人的研究文献都看到用到了,只是在原有基础上,略添一点儿稍有进步而已。

本书用的资料除了佛道教的儒家的经典,大量的录自历代文人的笔记,也有一部分来自古人记述社情民俗的专门著作。来自三教的文献,注意点放在与民俗有关、可以从某一民俗事象出发溯源的部分。事实上,三教中大量的哲学、思想性强的内容,涉及的很少,却是在民间容易产生影响的有关仪式、术数等征引较多。在儒释道三者本身的研究中,它们并不一定是重点资料,却是在民间影响较多的那一些。文人笔记中有写得非常好的,于学术、文学都有地位,不过我们也只是取其中与民俗事象,一时一地的社会心态的随记等等,所以每本取用也只是极少的部分。因为我们的本意不是写儒释道三者的历史和思想,也不是全面地谈中国的民俗。自从网络发展起来后,许多资料都可通过网络查得。但是网上的材料,不少是转引,而且也比较碎片化。作为学术研究,笔者还是主张尽可能阅读和使用第一手的文本资料,本书中的大多数古籍中的资料,都是第一手的资料,这一点是笔者一向坚持的学术作风。

四

本书中说的内容,大多数发生在古代,也有一部分是对现代社情的观察所得。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急速的变化往往使得原有的文化产生断裂,一部分的民俗事象被迅速忘记,这与精英文化有所不同。精英文化,无论著为制度,还是记于笔端,可以被超越被废止,但却易留下影迹,因为后人还可能从记述的文献中加以研究。民俗则要难得多,因为没有留下文字,其载体是直接的当事人或人群。因此,需要有心人随时将新的民俗事象记录下来。本书在修订时想努力做一做,但并未能担负其事。

说到目前的民俗,以及它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变化,在现实中仍是个大问题。就民俗事象言,本书中说到的,一部分已经在当代局部消失或趋于消失。比如过年的送灶、接灶,现今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消失的速度相当快。本来每户人家都有灶台,其烟道有一定长度,在灶台上建个小小的神龛以安顿灶王爷和灶王奶奶,不算难。一旦城市化推进,城里人基本上用燃气或电器,王宫已经无处安顿。另外,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许多地方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起了变化,其风俗也跟着变,却与三教扯不上关系。原本东北的农民由于气候条件限制,冬季几个月要么窝在家里,要么朋友聚在一堆喝酒聊天、打牌乃至赌博,所以年轻人容易打架滋事。而现在出外打工的增多,农业上大棚种菜、种菇、种草莓、种蓝莓,吸引了不少劳动力,原来的无聊被劳作所代替,民风也随之变化,赖、耍、酗酒、赌等陋习有所收敛。由于交通、网络、商品生产与流通等诸种合力的作用下,有些地方性的物产和相应的饮食习惯,也会流向全国乃至世界。书中曾讲到中国人的饮茶,在历史上与三教关系密切,但当代对之的影响与三教已经没有多大关系。尽管佛寺庙道观仍然保持着重饮茶、饮时讲礼仪的习俗——例如湖北省的王平道长,对于道茶的研究和推荐都很有力,他曾带我们一行人到一座佛寺去喝茶,那里

有口井称卓刀泉,传是关公卓刀之处。寺中茶、水俱佳,极其受用。而一般进寺见僧人,常有奉茶之举,青城山天师洞也会有茶道的体验——但民间对此已经不太理会。真正影响饮茶风尚的还是来自世俗。以前江苏、浙江人,绝大多数喜喝绿茶,像龙井、毛峰、猴魁、碧螺春等,皆为名品。但现在不少人已改喝乌龙、铁观音、正山小种等品种。近二十年来,云南的普洱茶炒得极热,其原产地的县名也改为普洱。这种茶,自有其好处,不过旧时主要销往藏区,内地虽用,但不太普遍。现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也与日本人推崇其健身价值有关。台湾茶从大陆引种,但在近数十年中,其加工工艺、新品开发都有独到之处,反销大陆,利润也很可观,此茶好销,则原有品种或相应减退。本书中也讲到节日习俗和娱乐习俗,本来与三教关系紧密,但现今也产生了许多变化。以节日言,传统的节日仍然在过,而且由于适应向传统回归的趋向,听取民众意见,端午、中秋放假,表现了对传统的尊重。但同时,现今的节日中,圣诞节、愚人节、情人节等洋节皆加大了影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还有更离谱的是人造的“双11”等节,纯是商业活动加上网络的推手,在城市里弄得“举国若狂”——我想比发明这一成语的子贡看到的大雉,更要热闹几倍。这些在眼前发生的变化层出不穷,有时甚至光怪陆离。采风者或有兴趣,一般研究哲学与宗教的,则似乎是一笑置之的多。至于娱乐,现今的年轻人,看电影、看电视剧的,比进戏园子要多得多。原先乡村里都有自己组织的剧团,演些传统的剧目,唱着地方特色浓郁的腔调,成为中国地方戏繁荣的基础,也成为儒释道的某些观念、故事深入民间的载体。而现在,大多数已经消歇或正在消歇的过程中,则三教对民俗的支配大大减小,可见一斑。此类变化,有些与传统的宗教和风俗有关,仍然有其研究价值,需要学人关心。

学人中对传统风俗以及佛教、道教、儒家越来越陌生,恐怕是大趋势。我不是复古主义者,无意去挽回这种趋势,也无法挽回。只是认为,对于这些已经过去或者仍在眼前演化着的情形,必须弄清它们的来龙去脉,揭示其内部包含的文化精神。这对于今人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体会曾经滋润过我们民族也滋润过每一代人的民族精神,是如何在实际生活中传承与演变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许这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反

思传统达到文化自觉,稍微能增加点儿助力。能这样的话,本书的任务也算是达成了。

2015 年 8 月 21 日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民俗

——三教扎根的土壤 / 3

第一节 礼乐的合宜与从俗 / 4

第二节 从巫风俗中飞升 / 13

第三节 入乡随俗 东土安家 / 25

第二章 共同致力于移风易俗 / 40

第一节 儒士的职责 / 41

第二节 阴鹭、果报和劝善 / 54

第三节 在民俗地盘上的相斥和相容 / 63

第三章 人生礼俗的规范(上) / 76

第一节 弄璋和弄瓦 / 77

第二节 养成与教成 / 80

第三节 姻缘、八字及头等吉礼 / 94